



Daxue Wenhua Chuancheng
Chuangxin Yanjiu

(第1辑)

大学文化传承 创新研究

高等教育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
载体，要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聚
集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
培育崇高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第1辑)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杨 河 主 编

杨海英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第1辑/杨河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301-22465-6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研究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7644号

书 名: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第1辑)

著作责任者: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杨 河 主编
杨海英 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奕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65-6/G·36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1.25印张 316千字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谈谈文化传承创新(代序)	杨 河	001
--------------	-----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兴国之魂

——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韩 震	02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的关联	郝立新	030
关于当前文化建设与和谐校园的若干思考	郭建宁	036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文化建设	徐进功	043
和而不同 守正创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整合与创新		
	何祖健	049
弘扬延安精神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李旭炎	057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 大力推进医学人文精神的建构		
	顾昭明	063

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历史使命

大学应当成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	谢和平	077
如何认识大学的文化功能		
——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张男星 王春春	084
文化传承创新:大学的责任与使命	曹国永	096

塑造中国大学精神 引领文化传承创新	文 君 101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承创新	向波涛、马 宁 108
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	蔡尚伟、阚玉娜 115
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价值实现	周 飞、钱宝平、张 健 127
文化传承创新视野下大学文化提升的路径选择	杨爱杰 133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学科建设

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意义	陈 来 143
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与关键	王登峰 148
文化传承创新与学术发展	杨国荣 170
文化传承创新:建立中国特色艺术教育体系核心理念	郑曙暘 175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须担当传统文化传承的职责	陆致宇 178

文化传承创新与以文育人

浅谈大学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	张维维 187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强化“文化育人”功能 ...	丁义浩、刘海龙、韩 斌 194
实现三个转变,夯实大学文化育人的基础	花建锋、韩宝志 202
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看高校的文化育人功能	贺善侃 209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育人的理性思考	刘献君 218

网络在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

论互联网对大学生文化观的强力影响	张 涛 227
把握导向 建设积极向上的大学网络文化	王建利 235
高校网络文化创新发展的趋势研究	周宏武 24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	赵 君、张 瑞 250
不断推进高校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繁荣	衣永刚 256

“微博”的兴起对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张小锋 264
--------------------------------	---------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探索

民族高校推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与创新

——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罗布江村 273
-------------------	----------

融通行业优秀文化 提升行业特色大学文化建设

——以中国石油大学为例	蒋庆哲 281
-------------------	---------

加强文化传承创新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

——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罗国振 289
-------------------	---------

“主题推进式”思想教育的文化传承导向

——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孙正林 296
-------------------	---------

理工科院校艺术教育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作用探究

——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例	高 艳 304
-------------------	---------

“教会学习 教会思考 教会审美”育人理念的内涵与实践

——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	姜恩来 311
-------------------	---------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

——以江西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为例	汪立夏 318
---------------------------	---------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践行文化使命 推进文化育人

——以南昌大学为例	南 宣 326
-----------------	---------

后记	332
----------	-----

谈谈文化传承创新(代序)

杨河

文化是历史的主线、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传承创新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认真探索新时期文化传承创新的规律与特点,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在原始自然界基础上所创造的一切,这种创造过程,一方面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也使自然具有了“人化”的属性。人类在文化的这种对象化活动中也在“进化”着自身,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延续着的文化,是多样和多层的有机统一体,其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即精神文化是主要内容。

所谓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的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文化”一词在拉丁文“cultura”中的原意指农耕和对植物的培育。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②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劳动史,是劳动者的历史。

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求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即内在尺度,遵循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即外在尺度,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事物,创造出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事物和环境,将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结合、统一起来,这就是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的传承创新,就是在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解决两个规律(自然规律和美的规律)、两个尺度(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对立统一,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人类历史的发展经过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一方面,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物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生态问题日益显示出危机的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物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问题。能不能依靠科技的进步来缓和和解决生态危机,形成新的生态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物质文化传承创新的前途和命运。

所谓制度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③这种社会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制度的潜在性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344页。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①文明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关系的不断制度化过程。

在社会制度的起源上,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越少,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②

在恩格斯讲的两种生产的制约下,社会制度以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复杂、复合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国家中。它最初表现于家庭,随着需要的发展和地域性、血族关系的打破,开始更多地表现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在这些社会制度中,一方面体现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内化着人类对自身关系的认识。

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它又是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一经确立就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制约人们的行为,即使存在的基础变化之后,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可以说,正是制度文化的可变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统一,保证和维系着人类历史文化的延续和过渡。

制度文化的传承创新既要受制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还要受制于思想观念即精神文化的发展。因为制度文化一方面要服务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的生产,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由于其可变性和相对稳定性兼而有之的特点,制度文化的传承创新,要处理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稳定是量变、是常态、是基础,改革是质变、是异常、是进步。从量变

①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到质变,是渐进过程和渐进过程的“中断”,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于人的自觉活动之中,制度文化更是凝聚着人的因素,面对稳定和改革的复杂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重要的历史经验。

所谓精神文化,主要是指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社会意识,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及其形式和成果。社会意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从反映社会存在的程度和特点来看,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层次;从社会意识主体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从对经济基础的关系上看,又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①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分工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制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分工和私有制存在的社会,代表着一定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④。“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72页。

④ 同上。

种虚假观念”^①。这种虚假性是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特征,是剥削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所以,“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②。除此之外,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广泛地体现在它的发展要受其内在的历史继承性和相互作用性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精神文化的传承创新,一方面要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要在历史继承的过程中依赖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借鉴促进。意识形态是这样,非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语言学、逻辑学等也是这样。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复杂纷繁、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构成了一定社会的整体风貌。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

为了避免误读马克思这个重要思想,恩格斯晚年特别指出:“根据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②

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文化传承创新的规律和特点非常重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物质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文化的基础,又要充分认识制度文化的建构性作用,因为它是文化结构,还要充分认识精神文化的指导性作用,因为它是文化的基因。

二

历史总是传承创新的统一,作为历史之灵魂的文化更是如此。文化传承,顾名思义,是指对形成于过去、延续至今的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扬。那么如何把握这个“过去”和“今天”?在时间的持续绵延中,“过去”和“现在”的区分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过去”在不断流逝,“将来”在不断到来,它们不断汇合又不断分离于“现在”,“现在”总是一个不断到来、又不断流逝的瞬间,稍纵即逝。

当然,我们可以在历史长河的意义上,将“现在”这个“瞬间”把握为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甚至一个时代,文化的传承也就存在于历史全过程的每一个时期、阶段或时代。每一个时期、阶段或时代都会面对不同的“过去文化”,文化传承也就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任务。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是包括周王朝之前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到了隋唐以后,文化传承已经有了佛教的因素,儒、释、道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可能想象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② 同上书,第732页。

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发生,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悄然而至。1898年严复译介《天演论》和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英国人布莱克撰写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后,西方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同时进入了中国,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新的启蒙和觉醒。“五四”运动以后,文化传承显然已经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这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就是文化,就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文化实践展现给我们的文化传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孔夫子”,代表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代表的则是近代西潮影响下,中国文化和思想所形成的新传统。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的思想文化,我们都应该有所分析、有所继承。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个先进政党的历史胸怀和文化自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从古代逐渐转入近现代以来已经170余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有新的眼界来看待历史文化的传承,从精神文化层面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上论,应该主要有三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新的启蒙和觉醒。中国共产党在90余年的奋斗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近代走过了漫长的曲折道路,如何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使传统文化适应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会现代转型的需要,中国人尝试过很多主义,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形成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把握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还创造了特色鲜明的革命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复杂的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新生和腐朽。继往开来,走出一条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传承创新道路。

2.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智慧

在世界几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蕴涵着极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人文智慧,主要体现在:第一,天人合一的人文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强调“万物一体”或是“道法自然”,崇尚仁爱万物、敬畏天命、顺应自然;第二,仁爱民本的人文价值观,认为爱人是普遍的道德原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仁者爱人、民为邦本,崇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忧民之忧”、“与民同乐”;第三,和合大同的人文理想观,认为事物只有达到矛盾各方面差异的统一,才能存在和发展,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原则是和谐大同,强调和实生物、以和为贵,崇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亲仁善邻;第四,发展变化的人文辩证观,认为事物都包含阴阳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崇尚自强不息、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第五,诚信正义的人文社会观,认为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治国之法,正义是处理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君子义以为上”、“义,人之正路也”,崇尚立身诚为本,敬事而信、见利思义、君子行义等,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思想智慧传播到世界特别是欧洲后,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德国学者莱布尼茨、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法国学者伏

尔泰,英国学者汤因比等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19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20世纪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西方人在反思“工具理性”和资本的价值追求中,将眼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启迪和智慧,表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们应当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尊敬传统、继承传统,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孕育民族精神、推动文化建设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3. 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理性到文艺复兴的启蒙理性,再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理性,理性主义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渗透在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领域,这种理性主义在其积极的意义上主要体现为:第一,科学进取精神,强调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推崇“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人们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第二,自由平等精神,强调人生而平等,推崇“天赋人权”,激励人们热爱自由、向往自由、追求自由、为自由奋斗;第三,民主法制精神,强调多数人的意志,推崇“社会契约”,激励人们蔑视专制、否定专制、推翻专制、埋葬专制。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曾经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举起的“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所体现的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这两面旗帜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作用,一直延续今天,还会影响到未来,已经深深融入中国近现代文化中。

向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学习,吸取文化元素,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是贯穿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全过程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全球化的展开,已经不存在可以置之度外的可能性选择,世界在进入中国,中国也在融入世界,纯粹的单一的封闭的民族文化早就不复存在,每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多方面因素的复合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传统。历史上,我们有过自我封闭、抱残守缺的时期,但是它留给中华文化的是落后和教训,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和经验。

不可否认,在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中,有着西方资产阶级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烙印,渗透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至上”思潮中,也暴露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理论困境和时代缺失,这是我们学习和吸收中要注意分析和鉴别的,但是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毛泽东早就告诉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化,才能赋予当今中国文化发展蓬勃生机,迎来辉煌前景。

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科学认识“历史文化”的这三个方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促成它们之间的交流和交融,形成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新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智慧的当代价值和西方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价值。

三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对立面的统一,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因为文化是不断积累积淀的,传承是创新的基础,而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传承,因为文化又是不断延续延伸的,创新是传承的发展。贯通传承与创新的中介和纽带是“发扬”。对“过去文化”的发扬既是传承又是创新,因为发扬什么,怎样发扬,体现的是一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文化选择。

文化选择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来源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和把握。从精神层面讲文化,文化就是文化,它受制于社会经济生活又不同于社会经济生活,因此,一方面,搞文化建设,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不能脱离国情;另一方面,又不可以将它简单地还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来对待它。从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来理解文化,它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远远宽泛和久远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仅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一方面,搞文化建设,不能没有意识形态眼光,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判断;另一方面,搞意识形态建设也不能没有文化视野,不能没有文化大局,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中,既不能人为地“淡化”意识形态,也不能人为地“泛化”意识形态。

按照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来把握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应该注意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

第一,在文化的延续上,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主体性精神家园,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这种自觉都是当代性的。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的认识,是从它的未来发展趋势上把握到的。因此,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时俱进,才是传统的发展方向。

第二,在文化的层次上,要处理好应用性和基础性的关系,应用性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日常生活实践层面,喜闻乐见,大众性特点突出;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层面,利益价值多元,市场化特点突出。基础性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学理层面,底蕴深厚、普遍性特点突出。文化需要世俗化,在一定意义上,世俗是文化的“本真”所在,世俗的社会生活是文化的海绵体,在这个领域中,一切文化因素的应用皆有可能;文化也需要学理化,学理是文化的“精髓”所在,学理的研究是文化的命脉,在这个领域,一切文化因素都要经过“整理”。世俗中有学理,学理引导世俗,从世俗到学理,再从学理到世俗,一切文化的可能性才能在现实和历史中展开。

第三,在文化的内容上,要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表象地看,科学旨在求真,人文旨在求善,但是真理从来就渗透着人文价值,伦理也离不开